

【諸祖耿 編撰】

戰國策集注匯考

(增補本)

上

諸祖耿 編撰

戰國策集注匯考

(增補本)

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戰國策集注匯考：增補本/諸祖耿編撰。—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729-206-7

I. 戰… II. 諸… III. ①中國—古代史—戰國時代—史籍②戰國策—研究 IV. K23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76902 號

書名 戰國策集注匯考(增補本)

編撰 諸祖耿

責任編輯 王華賁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印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江蘇省金壇市晨風路 186 號 郵編 213200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70.5

字數 1649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206-7

定價 180.00 圓(全三冊)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9—82338389)

出版說明

《戰國策》也稱《國策》，是一部獨特的國別體著作。此書記事年代大約在春秋之後、楚漢相爭之前，達二百四十多年。它主要記載了戰國時期策士游說諸侯、國君的活動和說辭，以及一些相關史實和歷史人物。它以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諸祖耿先生認為，《戰國策》的作者不是一人，是戰國時代的一群「游士」；「戰國策」名稱的意義應該是戰國時代的書本。

《戰國策》最早是分散的書冊，名稱不一，有「國事」、「短長」、「國策」、「事語」、「長書」、「修書」等說。這些書一直流傳到西漢，劉向（前七七—前六年）去其重複，校其脫誤，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按國別記述、分篇，計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總計為十二國、三十三篇。

《戰國策》雖然因其史學價值、文學價值和豐富的思想資源等，歷來受到世人的重視，但是在傳承過程中仍有散佚。東漢高誘注，北宋時已有殘缺，《戰國策》原書亦有缺佚。隨着出版業的發展，到北宋末期有了近十種「印賣本」，其中曾鞏訂補本影響最大。南宋形成兩種重要版本，一是姚宏注本，世稱「剡川姚氏本」；一是鮑彪改變原書次序所作新注，世稱「縉雲鮑氏本」，為國內現存最早的本。

宋刻本。元吳師道在鮑本基礎上作《校注》。近人金正焯有《補釋》，今人整理研究成果有郭人民《戰國策校注繫年》、繆文遠《戰國策新注》、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何建章《戰國策注釋》等。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西漢帛書，記述戰國時事，定名《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部分內容相同，可以參閱。

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諸祖耿教授撰著的《戰國策集注匯考》，由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於一九八八年榮獲「江蘇省第二次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榮譽獎」，一九九二年榮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等。該書至今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本次重印，補入了諸祖耿先生原來撰寫而未及放入的《前言》，相關的《戰國策》研究論文和資料，即《帛書別本〈戰國策〉初探》、《論〈蘇秦書〉》、《蘇秦法百家書說》、《漢墓蘇秦法書說存二十七章考釋》、《關於〈戰國策〉及蘇秦問題與徐中舒先生商榷》、《關於蘇秦問題的考察報告》等；對明顯訛誤作了訂正。

本次修訂重印，得到了諸祖耿先生子女的大力支持，以及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與研究所原所長李靈年教授、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張采民教授的無私幫助，增補了一些珍貴的資料和圖片；出版社編輯也對原書的一些標點與專名綫做了技術處理，對新增補的學術論文的體例格式和語言文字等進行了編輯加工等。希望通過修訂，增補新的內容，讓諸祖耿先生的學術成果得到較完整的體現，也使本書臻於完善。我們限於水平，可能有不當之處，希望得到讀者指正，以便再版時修訂。

前 言

這是一部《戰國策》的集釋。是把自有《戰國策》以來，有關這部書的各家注解，各種說明，匯齊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幫助以後研究這部書的同志，在理解本文和深入研究、參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時，不必東翻西閱，向渺茫的書海中搜尋資料，在閱讀上、研究上取得一些方便，減少一些困難。

《戰國策》，是戰國秦漢之間各個不同作家的作品。開始各自獨立，互不相關，有着各種不同的名稱，秦始皇焚書的時候，這些作品沒有被燒掉，後來續有增加，被保存在西漢王朝的皇家書庫。司馬遷編寫《史記》，把它作為戰國史料的主要依據。西漢末期，劉向整理書庫，把它彙編成書，給它題上一個名字，稱為《戰國策》。

《戰國策》的基本內容，是記載戰國秦漢之間，一群謀臣策士針對當時各種不同情況進行分析、研究，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作為解決當前問題的建議——說辭。這些謀臣策士，絕大部分從統治階級利益、包括自己個人利益出發，運用機智，展開雄辯，攬撥當時統治階級之間進行尖銳的鬭爭。其中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的因素。無論從史學的角度來看，或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都有它一定的價值。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一大批為封建制度服務，為維護封建皇朝利益效勞的自名為「衛道」的正

統的「大人先生」們是含着毒意敵視這部書的。他們說它是「詐僞權譎」的書，是「壞人心術」的書。只有東晉時代的袁悅，認識到這部書是「天下要物」，價值在《論語》、《老子》、《莊子》、《周易》之上。

由於這部書一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五代以後，就已經殘缺不全。殘存的本子，也是衍文脫字，錯誤百出。明清兩代，坊間流行兩種不同的本子，一是縉雲鮑氏本，一是剡川姚氏本，都不大好讀。清代學者譚獻指出這部書：「自漢至唐，無巨儒碩學編正論列。宋時館閣讐書，（曾）子固諸人理董亦有未緒。」（見《復堂日記》五）又說：「苟合參正，有待後賢。」（見《復堂日記》六）在他之前，黃丕烈、顧廣圻都有整理這部書的意圖，也都部分地做了一些校勘工作，可是沒有全面地展開作一番綜合性的闡述。在他之後，南匯于鬯進行勘研，寫成了一部《戰國策注》，但也未見刊行。

這部《戰國策集注匯考》，企圖把過去有關《戰國策》的注解、說明匯齊集合在一起，一方面便利讀者閱讀，另一方面，也有助於讀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現在爲了把《戰國策》這問題說得比較清楚些，下面分幾個部分來敘述：

一、《戰國策》的作者及《戰國策》名稱的意義

中國古代歷史，從專制主義的奴隸制國家周王朝中衰，到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皇朝建立，不久便掀起了大澤鄉的農民大起義，接着劉邦取得了起義的勝利果實，推翻了秦皇朝，建立了漢皇朝。繼續着秦皇朝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這裏包括了二百多年長期的分裂戰亂的時期。歷史上就叫做戰國時期。

一般的記載，都認為戰國開始，是從韓、趙、魏三家分晉（前四〇三年）算起，戰國結束，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前二二一年）為止。這裏說的戰國時期，時間要延長一些，從《史記·六國年表》開始的一年（前四七六年）到秦王子嬰降漢（前二〇七年）為止。

戰國時期，是兩種社會形態交替的時期，是奴隸社會轉化到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歷史大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時代特點，突出地表現在一群游士的活躍。

這時期的社會各階級是這樣的：

甲、統治階級

萬乘之主、君、

相、群臣、吏。

乙、被統治階級

市人、商賈之人、

農夫、

奴役、厮養士、厮役之人、僕、妾、帑。

丙、介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而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有貴族、士大夫沒落下來了的「士」、也有從村社庶民上升的一批「士」，特別是庶民上升的「士」，占着多數，於是有「大師」、有「門徒」。

《管子·小匡》：「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又說：「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愚。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生以聖王敬畏戚農。」可知「士」是從農奴中間培養

出來的。過去說「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這個概念，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自從春秋末年孔子開門授徒，門下「子張學干祿，顏回請適衛，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之後，中牟的鄙人甯越，爲了「苦耕稼之勞」學十五年而爲周威公師。「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一方面「士」向上爬，向統治階級靠攏；一方面，統治階級也向下拉，爭先恐後地吸引這批「士」，首先表現在魏文侯的禮賢，以子夏段干木爲師，魯穆公的用賢，優禮公儀休子思，接着齊威宣大興稷下學派。在這時期，一般游士、政客輕視勞動，脫離生產，安心過着寄生生活，暗中操縱着政治。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成爲戰國時代所特有的情況，超過了中國古代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養士都有三千人之衆，後來李斯諫秦逐客，所有這些，都可以從中看出這個時代的特點。這種情況，一直延長到漢皇朝吳楚七國叛變的時候。

文學舞臺，是政治舞臺的縮影。哪個階級在政治舞臺上占了統治地位，哪個階級必然要在文學舞臺上表現自己，成爲文學舞臺的主角。現在看《戰國策》這個舞臺上所出現的人物，更多的是哪一批「游士」，這就說明了戰國時代，是「游士」階層參與政治活躍的時代。我們從韓非子的書裏，看出當時韓非如何竭力反對文學游說之士，這從反面來看，也足夠證明當時游士的活躍。

這些游士，當他學習的時候，都有自己書寫的秘本書籍，作爲參攷資料。劉向《上晏子序》說：「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這裏所說的「後世」是晏子之後的戰國時代。所謂「辯士」，就是「游士」。游士著書在戰國時代是普遍的事實。從遺存的史料來看：「墨子南游使衛，關中（注：關中猶言周中）載書甚多。」（見《墨子·貴義》）他也說：「今天下士君子之書，不可

勝載。」（見《墨子·天志上》）莊子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又說自己：「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見《莊子·天下》）韓非子說：「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見《韓非子·顯學》）《呂氏春秋·常務篇》說：「備說非三王五帝。」什麼是「備說」呢？清代學者惠棟說：「備說是戰國書名。」從這名目上看來，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備說就是準備游說的參攷資料。我們從「備說非三王五帝」一句來看，可以知道當時游士們對於過去的歷史是能够採用批判的精神來對待的，和效法先王的儒家一味墨守陳規不同。魯仲連遺燕將書，（見《齊策六》）說：「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也。」他們說的三者，是指忠、勇、智謀。可以知道忠勇智謀的故事，一般說士，是都把它記在本子上，作為他們學習的資料的。韓非的書，有《說林》、《內外儲》，林有衆多的意思，儲，意味着積累，是積累衆多的材料，主要的目的是便於揣摩學習。後來漢代劉安有《說山》、《說林》，劉向也有《說苑》、《新序》，都是記載些叢殘小說，瑣屑語句，它的作用也和備忘待用相等。這就無怪蘇秦「簡練以爲揣摩」的對象，乃是「太公陰祕之謀」的一部奇書了。

由此可知，戰國是游士活躍的時期。戰國游士都有他們的祕本書籍，而這祕本書籍，有的是他們自己搜集材料把它記下來的。

戰國游士記下來的這份材料，經過秦皇朝的焚書，沒有被毀滅，後來保存在漢皇朝的書庫。我們看一看歷史記載，可以知道一些情況：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年）下令燒書，燒詩書百家語。特別定了一條法律，叫「挾書律」，凡是挾帶書籍的人，都要按律定罪。當時所燒的書，據記載：「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可以知道六國史官所記的檔案材料，都是被燬滅了的。記載又說：「非博士官所藏，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可以知道當時民間是不許私藏圖書的。但是詩書百家語還被保存在博士官手裏，沒有燬掉。後來蕭何跟着劉邦入關，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這些書後來被保存在西漢皇朝書庫。

禁止挾帶書籍的「挾書律」，一直到西漢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年）才明令取消。但在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年）到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年），這裏二十多年之間，民間雖然不準藏書，可是畢竟還是有私藏着的，「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張良從圯上老人受「太公兵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漢文帝劉恒（前一七九—前一五七年）使晁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這是西漢初年開始對讀書的提倡和獎勵。漢武帝劉徹建元六年（前一四〇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從衛綰這個建議中，可以知道西漢初年「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一般是爲人們所歡迎學習的。人們歡迎學習，一定有他們的書籍流傳。武帝時候，「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劉歆傳》也說：「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武帝太初元年（前一〇四年），司馬遷開始寫《史記》，取材於所看到的皇家書籍。到漢成帝劉鯨河平三年（前二五年），「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這年八月劉向（前七七—六年）校中祕書，劉向根據保存在西漢皇朝書庫裏的材料，發現戰國時期游士們所遺留下來的材料，「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經過他一番整理之後，便出現了《戰國策》。

《戰國策》作者究竟是誰？這問題過去一向很少有人提出來討論過，就是涉及這問題的說明，也很含糊，不甚明瞭。

首先說到《戰國策》作者的是劉向。劉向在他的校書錄中說：

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劉向這話，提出主名是「戰國游士」，可是戰國時間很長，游士又很多，究竟是那一個？他沒有搞清楚，他只說：「游說權謀之徒……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他雖然提出了「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長短之說」，但始終沒有確定哪一個人寫，而且還有問題，如果是這些人的話，是自己說了自己寫下來的呢？還是別人的記錄追叙？也不曾交代明白。

在劉向之後，班固寫《漢書·藝文志》，把《戰國策》列入「春秋家」，沒有說明什麼人撰，但很簡單地交代了一句，說這部書是：「記春秋後。」究竟什麼人記？什麼時候記？班固也沒有搞清楚。

北宋嘉祐年間（一〇五六—一〇六三），曾鞏編校史館書籍，重定《戰國策》，在他的序文中，同意劉向的看法，在涉及作者問題時，說是「戰國之謀士」，「戰國之游士」，也具體地提出了「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情況也和劉向一樣，沒有確實說明是哪一個。

南宋鮑彪爲《戰國策》作注，在他的序文中，認爲「國策」是「史家流」，「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又說：「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我們體會他這些話的意思，可能是他認爲《戰國策》是一人一手之作，這一人一手，一定是一個史家，而這史家，又是兼擅縱橫之學的。但這個人是誰？他也没有明言。

南宋乾道間（一一六五—一一七三），晁公武作《郡齋讀書志》，把《戰國策》編入縱橫家類，說：

歷代以其紀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縱橫者所著，當附於縱橫家。

鼂公武否定了《戰國策》是史家的手筆，明確地提出《戰國策》是「學縱橫者所著」。在認識上進了一步，但也沒有指出誰是作者。

南宋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葉適作《習學記言》，說：

《戰國策》國別必列蘇、張縱橫，且載代、厲始末，意其宗蘇氏學者所次輯也。

葉適的話，是值得重視的，他根據《戰國策》的具體內容，指出該書是「宗蘇氏學者所次輯」。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哪一個？但畢竟有了線索可以探求。

可是，南宋端平間（一二三四——一二三六），陳振孫編寫《直齋書錄解題》，還把《戰國策》編入雜史類，說：

《戰國策》三十卷，司馬遷《史記》所本，劉向所校者也，但無撰人名氏。

他非但沒有指出誰是作者，却又承認書的內容是真實的歷史故事。

清代康熙進士陸隴其，根據鼂公武的話，說《戰國策》是：「大抵皆縱橫家言。」

同時另一個進士張尚瑗說：

短長十二國之書，實出自一手，與《國語》列國冊書各為體例者不同。詞多重複，由其剪裁未施。事必照應，由其旨趣歸一。一時策士揣摩情勢，有擬之議之而未必其言之行之者，若慎子、蘇子之為楚太子謀是也。有如劄記奏牘，不必造膝面陳，若黃歇、韓非上書是也。其書出自六國之人，而非秦人，故於齊趙燕之亡，咨嗟忼慨，扼腕流涕。而蘇秦始將連橫一篇，純乎排抑秦人之辭，偏載之秦策之首。

又說：

其人偏出自縱人。

作者「出自六國之人而非秦人」，「其人偏出自縱人」，他說這話，比前面所說的幾個，又有了一些進步。但他認為「出自一手」，實際上是有意問題的。

乾隆貢生牟庭相，根據《史記·田儋傳》、《漢書·蒯通傳》，說：

《戰國策》即蒯通所作八十一首，劉向校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因除去四十八首為三十三篇耳。牟庭相認為《戰國策》的作者是蒯通。

近人羅根澤，基本上同意牟庭相的看法，認為《戰國策》出於蒯通之手，但不同意牟庭相的「除去四十八首為三十三篇」之說，以為「由八十一首變為三十三篇，是出於劉向的改編，不是出於劉向的除去」。

近人金德建也認為《戰國策》中司馬遷所採及的一部分，是秦漢之交的蒯通所作，其餘是蒯通、主父偃以後的一派人所作，其作期最遲也不得後於劉向的時候」。

從「戰國游士」、「學縱橫者」、「宗蘇氏學者」、「出自縱人」，最後落實到蒯通，可以說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努力得出來的結果。但蒯通是不是真正作《戰國策》的呢？這還需要作進一步研究。

現在，檢查一下《戰國策》裏及有關《戰國策》的記載中，估計可能有關《戰國策》作者的人名，略舉如下：

虞卿（三章）

魯仲連（五章）

荀況（「俛詩」不見於「荀子」，而見於《楚策》「客見春申君」章。又「蘇秦說秦惠王」一段中的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諸句，見《荀子·議兵篇》。

蘇秦（十六章）

張儀（二十六章）

蒯通（一章，說韓信，見司馬貞《史記索隱》。）

鄒陽（據司馬貞、李昉所引四事，並出「上梁王書」。前一四八年，漢景帝劉啓中元二年，鄒陽爲梁王說王長君。鄒陽上書，殆在此時前後。《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漢書·藝文志》鄒陽七篇，入縱橫家。）

除了上面所舉蒯通、鄒陽之外，還可以知道和《戰國策》有關的漢初人名，有：

主父偃《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主父偃傳》：「主父偃，齊人，學長短縱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說也。」《說苑·善說篇》：「有一段主父偃，人而無辭，安所用之」的話，其中引子產、王孫滿、蘇秦、蒯通等事，結論說：「辭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根據服虔的話，主父偃學「蘇秦法百家說」，必然和《戰國策》有關。）

邊通（《漢書·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戰國策名短長術。」這裏可見《戰國策》和邊通的關係。）

蒯通、鄒陽、主父偃，都是齊人。今本《戰國策》三十三卷，「齊策」占六卷，於數爲最多，其他各書所引《戰國策》超出今本之外而涉及齊事的，不下十餘條，孫臏、龐涓、田單事都在內。此外，散見於其他子部著作中有關齊人的「說士」，爲數也不少。齊從稷下興學以後，游士一直不斷，我們可以說

絕大部分的游士出於東方。

從《戰國策》裏有鄒陽上梁王書，可以知道《戰國策》決非蒯通一人所作。爲了搞清楚這個問題，下面兩個問題首先應當加以研究解決。

一、《戰國策》是不是史家的記載？

二、《戰國策》是不是全是縱橫家言？

戰國時期，列國是有史官擔負記載的責任的。可是秦并天下，「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可見燒書的結果，最不幸而終於滅亡的，是諸侯的史記，而被保存下來的《戰國策》，決不是史官記載的諸侯史記可知。在此之前，魯史官記載的《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前四八一年），《左傳》終於魯悼公元年，即周貞定王二年（前四六七年），從《左傳》之終，到周顯王三十五年（前三三四年），列國稱王並紀年天子致文武祚於秦（見《釋史》），其間有一百四十年之久，沒有文獻資料，這是歷史記載的空白時期。

戰國時期，本來有列國史官的記載，可是給秦火毀滅了，所以論史官的記載，戰國時期，也是一段空白。我們今天所以能夠知道一些戰國的事迹，主要是靠保留下來的「諸子傳說」，以及《戰國策》裏的材料。但是，《戰國策》不是史家言。

《戰國策》不是史家言，《戰國策》是不是全是縱橫家言呢？也不盡然。《魏策一》有田子方吳起。田子方學於子貢（見《呂氏春秋·當染篇》），吳起學於曾子（見《史記·吳起傳》），他倆都是儒家嫡系，《趙策三》有虞卿、魯仲連，《漢書·藝文志》二人同列儒家，而他倆都有排難解紛的話，記在《戰國策》裏。至於孫卿之爲儒家，這是他自己承認而且也是大家所公認的，現在《楚策四》有他的謝春

申君書，另外還有一首俛詩，不見於《荀子》，僅見於《戰國策》。這可見《戰國策》裏有儒家言。

《宋策》開首第二節，就有墨子救宋一段，可見《戰國策》裏有墨家言。

《魏策二》有惠子，惠施是名家，可見《戰國策》裏有名家言。

《魏策一》有公孫鞅，《秦策一》有衛鞅。公孫鞅、衛鞅，就是法家的商鞅；《秦策五》有韓非，而《秦策一》的「張儀說秦王」一章，就是《韓非子》裏的「初見秦」。韓非是法家，可見《戰國策》裏有法家言。

《齊策四》顏歌對齊宣王引「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策又稱歌「知足反樸終身不辱」。一語並見《老子》。《魏策一》「故老子曰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這話亦見《老子》。《韓策二》「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老子、列子都是道家，可見《戰國策》裏有道家言。

儒、墨、名、法、道，《戰國策》裏都有，可見《戰國策》不全是縱橫家言。

《戰國策》不是史家的記載，不全是縱橫家言。那末它是怎樣的一部書呢？我說，它是戰國到漢楚之際，一群游士各自記錄下來的或者雜集抄撮的一部分材料。這其間各家各派都有，而占最多部分的，則是縱橫家的游說。因此，《戰國策》並不出於一人之手，說它是蒯通所著，這是與事實不符的。

《戰國策》這份材料，平時以各種不同的本子散在各人自己的手裏，它的作用在於揣摩、參考。這些材料沒有給秦火所燒，後來被保存於漢家皇朝的書庫。

由於私家筆記不同，說士所載忠勇智謀之事，彼此所寫互有出入，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詳，有的